

第

一

章

吐鲁番唐代交通路线的考察与研究

## 引言

丝绸之路作为古代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主要通道，因其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巨大作用与崇高地位，一直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汉唐时期中西交通的主干线，通常指从长安或洛阳途经中亚沙漠绿洲地带，横贯欧亚大陆，至地中海沿岸罗马的路线，总长达 7000 余公里。学术界研究丝绸之路的许多热点问题都集中在我国古代西域，即大致为今新疆地区。吐鲁番地区唐代为西州，正是唐代丝绸之路我国经西域沟通西方，以及西方通达我国所必经之地。研究这一地区唐代的交通路线，对进一步研究唐代西域的交通路线和唐代经营西域诸多涉及交通之大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对研究唐代围绕这一地区发生、进行的商贸和宗教文化等活动大有裨益。

吐鲁番地区位于新疆天山东部山间盆地。东邻哈密盆地，东南接敦煌地区；西达伊犁河流域，西南连通焉耆盆地；北越天山沟通天山以北地区。其贯通天山南北的山间孔道自古便是连接天山南北塔里木盆地、准葛尔盆地两大盆地和昆仑山、阿尔泰山两大山系

的重要通道。吐鲁番地区是古代西域北道干线必经之地，同时又有数条道路连通西域南道，所在地理位置极为特殊。因此，吐鲁番地区自然成为古代西域南北往来、东西交通的要道和十字路口，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根据史籍记载，唐以前吐鲁番地区的建置大凡有三次重要变化。最初是戊己校尉屯驻之所，始于汉初元元年（公元前 48）迄止于晋咸和二（327）为高昌壁时期。此后前凉张骏于其地置郡县，始于晋咸和二迄止于魏太平真君三年（442），为高昌郡时期。再后来，沮渠无讳居其地立国，始于沮渠氏承平元年（443）迄止于麹氏延寿十七年（640）为高昌国时期。唐贞观十四年（640）灭麹氏高昌王国以高昌故地为西州。置五县高昌（天宝元年曾一度改为前庭县）柳中、交河、天山、蒲昌并置安西都护府予以统领。高宗显庆三年（658）改置西州都督府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天宝元年（742）一度改为交河郡，乾元元年（758）又恢复为西州。德宗贞元七年（791），西州失陷于吐蕃。唐王朝实际领有西州计 151 年。

关于吐鲁番地区汉唐时期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和作用，《史记·大宛传》记载姑师虽为西域小国却“当空道”控制着西汉通西域的交通要道，其地理位置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武帝经略西域便要首先控制姑师。<sup>①</sup>《汉书·西域传》总序以车师为北道起点，更为充分地反映出西汉王朝对车师的重视，以及车师在西

<sup>①</sup> 《史记·大宛传》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楼兰、姑师小国尔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遣从驃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元封三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另外关于姑师《汉书·西域传》记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汉武帝之前姑师辖地包括车师前后王以及且弥、卑陆、蒲类等地。车师前王辖地与今吐鲁番地区大致相当，史书记载中的车师也大多专指车师前王辖地，即今吐鲁番地区。与汉朝交涉最频繁的也是车师。因而，《汉书·西域传》有车师传没有姑师传。

域交通方面举足轻重的作用<sup>①</sup>。《后汉书·西域传》则已明确点明了车师前部为西域门户的交通枢纽地位<sup>②</sup>。《隋书·裴矩传》肯定高昌不仅是西域之门户、中道的重要枢纽，而且还是西域南北中三道诸国南北交通路线的枢纽。至唐代，西州作为中西交通主要路线和西域内部交通重要枢纽的地位更见突出。因此，唐王朝进一步利用西州优越的地理位置，把西州发展成为其经营西域的进可攻退可守的大本营。从而，使西州内外交通路线在唐代西域交通网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于唐代西州交通路线的研究最早始于清代。自乾隆以后边徼多事，嘉庆、道光年间，学者逐渐留意西北边陲，遂形成著名的西北学派<sup>④</sup>。其中不少学者系统地对西域（新疆）的历史沿革和历史地理进行考察与研究，自然也就关涉到唐代西州的交通和重要城镇名称，以及地理位置。比较有影响的著述大致有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顾祖禹、万斯同等人编修的《大清一统志》、刘庸、何国宗等编修的《钦定皇輿西域图志》、徐松的《西域水道记》、陶保廉的

《汉书·西域传》总序记载：“自玉门关、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出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戍已较尉更互屯焉。”

《隋书·裴矩传》记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林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钹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

西北学派以徐松、张穆、何秋涛以及其后的丁谦为代表人物。

《辛卯侍行记》王树楠、王学曾等编修的《新疆图志》以及谢彬所著《新疆游记》<sup>①</sup>。这之中以《西域水道记》和《辛卯侍行记》最为精心结撰之作，考证有得之处颇多。《新疆图志》秉笔实录新疆的山、水、道路和军政建制等方面情况，也是今天研究新疆史地的重要资料。不过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最早是随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轰动世界的西域探险热的兴起而开始。三、四十年代，这方面的研究又达到一个高潮，以冯承钧、岑仲勉等学者为代表。

本世纪初以来，众多东西方国家探险队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探险有不少重要收获，尤其是数量惊人的敦煌和吐鲁番文书、文献的发现，为研究中西交通史提供了大量材料。其中直接关系唐西州交通路线的则是伯希和（P. Pelliot）携走的敦煌文书第 2009 号《西州图经》残卷。而有关西州交通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以安部健夫（日）《西回鹘国史的研究》和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为代表。与交通有关的高昌和西州的城镇，及城镇地理位置，论及的学者较多，其中以冯承钧、黄文弼、岑仲勉的论述较为全面和具有代表性。关于高昌城镇数目的论证则以侯灿《麴氏高昌王国郡县城考述》较为全面。

在这个领域内，经先学们不断地努力，西州与外部交通的路线如伊西路、银山、白水涧道、他地道等道路的大致方向已基本明确，只是具体路线未得确定。其他如《西州图经》记载的大海道、萨捍道、突波道、移摩道、花谷道等道路虽多有推论，但是尚未形成一致观点。西州内部交通线，也没有全面具体地进行讨论和考证。直接关涉交通的西州（高昌）诸城镇的地理方位除高昌、交河

谢彬此书写成于民国初年，但其关于古代道路记述论证的方法与西北学派一脉相承，所以也把他归入西北学派。

冯承钧《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黄文弼《高昌疆域郡城考》载《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岑仲勉《吐鲁番一带汉回地名对证》载《中外史地考证》。

因有明确的考古材料，以及文献记载得以确证外，余者多是依据文献、文书所做的推论，绝大部分城镇的地理方位，学术界还未取得一致看法。此外，与交通线关系非常密切的西州烽燧警戒线，也未引起学者的重视。有鉴于此，本书拟改变前人主要依据文献资料，就某些个别问题进行孤立研究的方法。把吐鲁番地区作为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和历史单元，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学实证资料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力图再现唐代西州地区交通的原貌。另外，古代城镇是古代交通线的重要坐标点或曰枢纽，落实西州主要城镇的地理方位，对明确西州内外部交通路线而言意义重大。吐鲁番地区大量存在的南北朝至唐代的古城遗址、居住遗址和烽燧遗址正是我们赖以确定唐西州主要城镇的重要依据。因而，考证落实西州主要城镇和地理方位也是本书努力的一个主要方面。再者，唐代边陲镇戍烽燧的设置大多傍依交通线，西州自不例外。吐鲁番地区大量存留下来的古代烽燧遗址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唐西州烽燧警戒线研究，对标识西州交通路线无疑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本书在继承唐代西州交通线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作者亲自对吐鲁番地区沟通周边地方主要天然交通孔道和吐鲁番地区南北朝至唐代的古城、镇戍、烽燧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取得的考古学考察资料，在考证西州各主要城镇及其具体的地理方位，阐明西州政区和主要行政区划的同时，兼及西州烽燧警戒线。进而与历史文献和出土文书、碑铭，以及其他方面的考古发现和地下出土物相参证。说明西州连接外界各主要道路的实际走向和具体路线。标明在西州交通中起枢纽作用的重要城镇，系统阐明唐西州内外部交通网络。实际上，本书是以对吐鲁番地区古代交通路线、城镇、烽燧遗址的考古学考察资料，结合出土文书和史籍为骨架的二重参证的研究记录。

## 第

## 二

## 章

吐鲁番唐代交通路线的考察与研究

## 吐鲁番史事记略

西域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般认为始于张骞首次西使。张骞首次西使，目的在于为西汉连接月氏、夹击匈奴。这是西汉经营西域，即《汉书·西域传》所谓“通西域”的特殊目的——“断匈奴右臂”。也是《汉书·西域传》所谓“事征四夷”统治思想的具体反映。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是，汉初就已崛起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匈奴一直是西汉政权最大的直接威胁。我国古代历史上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政权对中原政权的威胁，是历代统治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不仅秦汉如此，自魏晋以至隋唐以下无不如此。

这些游牧政权在其能力所及之时都极力控制西域或力图控制西域。个中缘由在于控制西域便等于控制以天山为界的中西交通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的咽喉路段。巨大的商贸利润和控制者源源不断获得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多种精神和物质的补充，又是维持控制者强大军力的有利支持。而自西汉始中原政权经营西域的目的，除打击削弱北方强大游牧政权和如《史记·大宛传》所说：“广地万里 重九译 致殊俗 威德遍于四海”之外 还有保持

丝绸之路畅通‘致四方异物’的强烈经济、文化要求。吐鲁番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绿洲自然环境成为我国古代历朝政权经营西域必须控制的目标。

### 一、姑师与车师时期

有关吐鲁番地区历史的最早文字记述始见于见于《史记》，续见于《汉书》。当时这一地区被称为‘姑师’。《史记·大宛传》有‘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此处‘邑有城郭’，《汉书·西域传上》鄯善国条作‘国有城邑’。所谓‘盐泽’根据同传《正义》引《括地志》记载为‘蒲昌海一湖泽，一名盐泽，亦名辅日海，亦名穿兰，亦名临海。’即今罗布泊。这段记载相当简略，据此只能给人一个十分笼统或说含混印象：姑师是一个临近罗布泊，还可能也与楼兰为邻的城市国家。至于和楼兰是否直接相邻，则无从得知。

《史记·大宛传》还记有‘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此处“小国”，《汉书·张骞传》的记载相同。所谓“小国”根据《史记·大宛传》关于楼兰、姑师皆属‘兵少易击’之列的记载，姑师确为人口不多，兵力很弱的偏邦。这样一个小国绝对没有可能直接有效地控制从东天山到罗布泊，如此广大的地域，姑师的主要活动地域当为吐鲁番盆地。前文所说‘临盐泽’应该是在从罗布泊到东天山这一区域内没有可与其匹敌的其他势力，姑师势力能够到达罗布泊，而非指其有效控制疆域。所谓的“空道”，即西汉通西域的主要道路，也就是西汉时期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主干道路——丝绸之路。

姑师的灭亡直接缘于西汉经略西域。西汉初年，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万”，力量强大连年侵扰汉朝边境，严重威胁着汉朝北方地区

与本书观点相近或相左的看法不少，主要的参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一部分，中央民族出版社，1987年；余太山《汉书·西域传》所见塞种——兼说有关车师的若干问题》，《塞种史研究》附录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王素《高昌史稿》，文物出版社，1998年，6~9页。

的安全和生产发展。因此 当汉武帝即位 在汉初六、七十年休养生息经济发展，国力日益强盛的形势下，先后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出击。结果匈奴战败，其主力不得不退出河套及河套以西地区并一度出现“幕南无王庭的局面”。虽然如此 但是由于匈奴在天山东部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地区的势力并未受到削弱，力量仍较强大，依然强有力地影响着西域，所以对汉朝的威胁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 汉朝为彻底击败匈奴 根除边患 采取了联合“西域诸国”断匈奴“右臂”夹击匈奴的策略。此后 西汉、匈奴为争夺西域展开了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中，姑师是争夺的焦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以蒲类海为大本营，控制了天山东部地区。此外 匈奴西边日逐王还在焉耆、危须、尉犁间置“童仆都尉”控制了天山南麓一带。匈奴在西域的上述态势是与姑师密不可分的。

姑师王治交河城，控制着吐鲁番盆地及博格达山以北一带。其辖境的东北部与匈奴右部相邻，因此匈奴染指西域，一向是通过姑师的山北地带向西直达乌孙；向南通过姑师本部及今吐鲁番盆地到达焉耆、危须、尉犁 以及天山南麓的其他地区。显然 匈奴要想达到控制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目的，必须假道姑师。特别是当汉通西域之际，西汉、匈奴之间的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姑师对匈奴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时匈奴一方面，要加紧利用姑师这条通道来强化对西域的控制，以确保后方安全，保证给养和兵员的补充，并联合西域诸国共同对抗西汉。另一方面，又要利用姑师特殊的地理位置来阻挠西汉通西域。所以，此时姑师这条通道，实际上已成为

《汉书·匈奴传》。

《汉书·西域传序》：“西域诸国大率土著 有城郭田畜 与匈奴、乌孙异俗 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童仆都尉 使领西域 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 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与匈奴安危密切相关的生命线。此外，对于西汉而言，汉王朝若要达到联合西域诸国、断匈奴右臂的目的，也必须首先控制姑师不可。由于姑师与匈奴邻接，且当汉通西域的孔道，故只有控制姑师，才能确保汉通西域之路畅通无阻；才能切断匈奴董仆都尉的后援，使其失去立足的基础，从而消除西域诸国的后顾之忧，使之诚心归汉。也只有这样，汉朝才能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并进而将这条右臂再植于自身，以抗击匈奴。如是，西汉的力量便可直接出现在匈奴的背后，形成夹击匈奴的态势。因此，姑师无论对匈奴还是对西汉来说都是“必争”之地。此之后吐鲁番盆地对我国古代历朝中原政权经营西域的大业而言，都是必争之地的形势一直未变。

《史记·大宛传》记载：“明年（元封三年即公元前108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掳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于是酒泉、列亭、鄯至玉门关矣。”自此拉开西汉为经营西域而与匈奴争夺姑师的序幕。西汉击破姑师国后，姑师分裂为车师前、后部和天山以北六国。车师前国与天山北部的车师后国和其他六国不同，独处天山以南的吐鲁番盆地一带。而“姑师”与“车师”实为同名异译，二者的古代读音极为近似。西域地名的这种同名异译现象，因其重九译的历史背景，在我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典籍，以及相同历史时期不同典籍中大量出现。这是一种惯常现象，不足为奇。即便现代，我国不同语言地名的翻译过程中，在未作规范之前，也仍然出现五花八门的不同用字。

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与匈奴为争夺姑师共进行了五次较大的战役。第一次战役：“武帝天汉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兵始击车师。匈奴派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

姑师分裂的时间学界讨论较多意见并不统一。本书认同“元封三年或稍后”的看法。参见王素《高昌史稿》文物出版社，1998年9月，11、64~68页。

《汉书·西域传上》记载：“及破姑师，未尽殄灭，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

兵不利引去。’第二次战役：‘征和四年 遣重和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 道过车师北 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 勿令得遮重和侯。诸国兵共围车师 车师王降伏 臣属汉。’第三次战役：‘昭帝时 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 遣五将将兵击匈奴 车师田者惊去 车师复通于汉。’第四次战役：‘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罪刑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熹发城郭兵万余人，自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 攻交河城 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 未得 会军食尽吉等且罢兵 归渠犁田。收秋毕 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王闻汉兵且至 北走匈奴求救 匈奴未为发兵。王来还 与贵人苏犹议欲降汉 恐不见信。苏犹教王击匈奴边国小蒲类 斩首 略其人民 以降吉。……匈奴闻车师降汉 发兵攻车师 吉、熹引兵北逢之 匈奴不敢前 吉、熹即留一侯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归渠犁。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见杀也，乃轻骑奔乌孙，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东奏事，至酒泉，有诏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吉还，传送车师王妻子诣长安 赏赐甚厚 每朝会四夷 长尊显以示之。于是吉始使卒三百人别田车师。’第五次战役：‘得降者言 匈奴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 近匈奴 使汉得之 多田积谷 必害人国 不可不争也。’果遣骑来袭田者。吉乃与校尉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复益遣骑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匈奴将即其城下谓吉曰：‘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数日乃解。后常数千骑往来守车师。吉上书言：‘车师去渠犁千余里 间以河山北近匈奴 汉兵在渠犁者势不能相救 愿益田卒。’公卿议以为道远烦费 可且罢车师田者。诏遣长罗侯将张掖、酒泉骑出车师北千余里，扬威武于车师旁。胡骑引去。吉乃得出，归渠犁，凡三校尉屯田。车师王之走乌孙也 乌孙留不遣 遣使上书 愿留车师王 备国有急 可从西道以击匈奴。汉许之。于是汉诏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 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

官与匈奴绝 亦安乐亲汉。”这段记载,《资治通鉴》卷二五记为元康二年。此次西汉与匈奴争夺车师 汉得其民 匈奴得其地 。数年后,西汉再次规复车师。“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后日逐王畔单于 将众来降 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 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吉为安远侯。是岁 神爵三年 (公元前 59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童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 不得近西域。”西汉设置都护负责西域事务 不仅开创了中原王朝统治西域的新局面,而且从此揭开汉民族开发吐鲁番地区历史的序幕。

西汉神爵二年秋,由于匈奴日逐王降汉,车师完全成为汉的属国。汉始置西域都护,并护西域南北两道。北道因近匈奴,为加强控制 又置戊己校尉在车师前国屯田。《汉书·西域传》下记戊己校尉刀护曾遣“司马臣韩玄领诸壁,右曲侯任尚领诸垒”。著名的高昌 西汉为屯军壁 东汉为斥候垒 魏晋才渐具城市规模 。高昌之名 始见于《汉书·西域传下》 当时为“高昌壁”。并由该文的记载得知 高昌壁在西汉平帝元始中(公元 2年前后)已经存在 当时也已经成为戊己校尉治所 。关于高昌一名的由来,至今学术界还未有统一意见。《北史·高昌传》记载:“昔汉武遣兵西讨 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 人庶昌盛 因名高昌。”这是传统说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

西汉以郑吉为都护,《汉书·百官公卿表》作地节二年,《传赞》同,《帝纪》作神爵二年,《通鉴目录》亦作二年。郑吉封侯在神爵三年,置都护当在神爵二年。详细论述见黄文弼“高昌史事略”载《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 文物出版社,1989年6月,157页。

王素《高昌史稿》,文物出版社,1998年9月,69页。

《汉书·西域传下》记载:“元始中,……戊己校尉徐普……召姑句……系之。姑句……突出高昌壁,入匈奴。”

法，今人不断提出新看法。苏北海先生认为：高昌一名乃由高车之名讹转而成。这一观点过于牵强，学界同意的人不多。余太山先生认为：高昌实际为塞种部落或部族 Gasiani 的对译。王素先生认为：高昌实得名于敦煌高昌里。王素认为高昌壁最初应为敦煌县高昌里派出士卒之居地，这些士卒为表示对故里的怀念，故名之为高昌。本书认为《北史》的记载有其合理性并不违背地理命名的惯常做法。只是，还存在一种可能：高昌可能就是当时当地土著语言的音写。车师人在西汉势力到达吐鲁番之前早就长期活动于东天山一带，吐鲁番地区除去天山沟谷中某些地方适宜游牧外，盆地中适合生产、生活的地区只有吐、鄯、托三块较大的绿洲地带。高昌故城地方正是丝绸之路吐鲁番路段干线必经之地，不能排除早就因为农、牧、商方面活动而有人居住。自然也就不能排除有原始名称的可能。西域胡人前往河西或中原经商古来有之，敦煌作为河西门户当然是商贾云集之地，这样敦煌县高昌里一名也不能排除因来自车师高昌的胡商聚居而得名的可能。

平帝时王莽秉政西域诸国大都叛离元始年中车师后王姑句，及婁羌王唐兜出亡投降匈奴。王莽篡位以后，贬易西域诸王，始建国二年（10）车师后王须置离准备投降匈奴戊己校尉刁护把须置离押解到西域都护但钦的治所处死，须置离的哥哥狐兰支举国出亡匈奴并与匈奴连兵进攻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是岁史陈良、终带反叛杀校尉刁护出亡匈奴。这期间王莽虽然一度与匈奴和亲。但是因为王莽欺辱单于，导致匈奴大举犯边，致使西域瓦解。始建国五年（13），焉耆反叛，杀都护但钦。新莽于天凤二年（15）派遣五威将出兵西域，战败。王莽死后，西域与中原政权

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261~268页。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附录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10页。

王素《高昌史稿》，文物出版社，1998年，72~74页。

的直接联系就此中断。

从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与匈奴争夺车师开始，到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 61 年）共四十年间，车师与西汉时离时合。直到神爵二年，郑吉出任西域都护，兼护丝绸之路北道车师方才完全内属。此后，一直到王莽始建国二年，车师叛离西汉王朝直接管理车师 70 余年。

王莽时，西域与中原政权断绝往来，重新役属于匈奴。匈奴加重西域诸国的赋税，诸国均感不堪忍受。东汉初年，西域诸国大多向中央政府提出内属的要求。光武帝因天下初定，无暇顾及西域。明帝永平年间，匈奴挟持西域诸国共同侵扰河西郡县。焚毁城邑，杀略甚众，以至城门昼闭。永平十六年（73），明帝派大将窦固、耿忠等出居延塞征讨北匈奴，取伊吾卢地。随后班超趁势服鄯善、降于阗，“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sup>①</sup>”。第二年，窦固、耿秉击破白山，降车师前后王，复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车师与西域诸国遂内属。明帝死后，车师屡次反叛，章帝乃召还戊己校尉，车师与中原的联系再次中断。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永元二年，窦宪、窦固派副校尉阎 将三千余骑，击破伊吾。永元三年，班超平定西域，复置戊己校尉，派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到安帝永初元年（107），西域复叛，车师与匈奴屡次寇扰河西。延光年中，安帝采纳陈忠的建议，派班勇为西域长史，西屯柳中。班永击破车师，杀车师后王军就，西域复通。字建武至延光，西域三绝三通。阳嘉以后，东汉朝政衰败，西域诸国转向陵伐。桓帝永兴元年（153），车师后王阿罗多，围攻东汉屯田且固城，杀伤吏士，出亡匈奴。敦煌太守宋亮，立军就质子卑君为后部王。阿罗多复与卑君争国。戊己校尉阎 详，担心阿罗多招引匈奴扰乱西域，于是收夺卑君印绶，复立阿罗多为车师后部王，把卑君安置在敦煌。从此车

师与东汉渐次疏远。

东汉从明帝永平十六年到桓帝永兴元年计 80 余年西域时绝时通均以车师为争夺的中心。这以后东汉朝政腐败，宦官弄权，直至汉献帝末年都已无暇顾及西域。

曹魏时期，西域与曹魏政权的关系相当疏远。曹魏政权唯一能直接控制的西域地区是高昌。它以高昌壁为治所，设有西域戊己校尉管理西域事物和对周近地区施加影响。车师后部紧邻戊己校尉治所之北，而它与中原政权则几乎达到正式的君臣关系：曹魏曾赐其王一多离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晋初置高昌郡设太守统领。而车师王居交河城如故。前凉张轨，后凉吕光，及沮渠蒙逊等割据河西时皆置高昌太守。这期间车师自为王如故。后魏太平真君三年（442），沮渠无讳西走鄯善，据有高昌，奉表于宋文帝拜为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高昌有王自此始。真君五年（444）沮渠无讳死沮渠安周代立。太平真君十一年（450）沮渠安周破车师，车师王车伊洛之子车歇，收遗民亡奔焉耆，车师前部灭亡。

## 二、麴氏高昌王时期

在麴氏领有高昌之前，最初称高昌王的，是阚伯周。当时沮渠氏虽然占据高昌，然而其东北部的柔然、高车不时侵扰。北魏和平元年（460）沮渠氏被柔然消灭。柔然立阚伯周为高昌王。北魏太和初年阚伯周死子义成立被从兄首归所杀。太和五年（481）高车王可至罗又杀首归，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国人杀张孟明，立马儒为王，巩顾礼、麴嘉为左右长史。太和二十一年（497）马儒上表请求内迁国人反对又杀马儒立麴嘉。由此拉开麴氏高昌王国 140 余年历史的序幕。

西域的主要文明中心集中位于交通干线上的几个强大城邦国家的周近，如高昌、于阗、龟兹、焉耆等。这些地区的繁荣基本上依赖于东西方的交通和贸易，换言之，即西域诸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与外界的交往。所以它们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主动推进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另一方面，西域周边的强大政权在相互争夺中，均竭力阻挠对方与西域交通，而自己则千方百计沟通之。麹氏高昌王国的长期存在与最后灭亡都与这两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有关。

两汉以后，继鲜卑、柔然、高车、哒之后，崛起于中国北方的突厥汗国逐步将其势力扩张至西域。从 6 世纪中叶至唐初成为统治西域的主要势力。西域诸国中，麹氏高昌王国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它不仅与突厥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也是与中原地区交往最多的西域政权。自唐朝建立时起，麹氏高昌与唐朝就开始频繁交往，并对唐朝表示特别的忠顺，“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奏以闻”。贞观四年（630）冬，麹文泰亲自到长安朝贡，唐太宗向他颁赐了大量物品，并且满足了高昌王妻子宇文氏“请预宗亲”的请求，赐姓李，封安乐公主。

高昌与唐朝关系恶化的直接起因与丝绸之路贸易有关。过境贸易是丝绸之路沿途绿洲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丝绸之路畅通与否，对西域国家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隋末大乱，大碛路不通，西域各国朝贡使臣、商队都经过高昌前往内地，高昌通过垄断商路获得了很大的收益。贞观六年（632）焉耆请求唐朝主持重新开辟大碛路，以方便商旅往来。唐太宗同意了焉耆的请求，但这却严重伤害了高昌的利益。于是高昌完全投靠西突厥，与西突厥连兵攻破焉耆五城，转而公开与唐朝为敌。此外，在唐灭东突厥之后，许多被东突厥掳掠的汉人从漠北逃到高昌，高昌拒绝把这些人交还

给唐朝。与此同时，与唐朝为敌的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在征服处月、处密部后与高昌一同劫掠商旅，阻塞商路，严重地威胁着唐朝与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和唐朝的西部边疆。贞观十三年十二月（640年初）唐太宗下诏，以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大军讨击高昌。高昌王麴文泰惊惧之下发病而死，其子麴智盛继位，兵败投降。贞观十四年九月，唐朝完全控制了高昌。

高昌在这次战争中之所以冰消瓦解迅速崩溃的最重要原因，是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势力对高昌的背弃。高昌是在乙毗咄陆可汗支持之下公然反唐的。当唐朝军队进军高昌时，乙毗咄陆可汗派遣阿史那步真叶护驻守可汗浮图城，与高昌军队形成犄角之势，抵御唐军。但是在侯君集进抵高昌时，乙毗咄陆可汗“惧而西走千里”，阿史那步真也率领属部投降了唐军。乙毗咄陆系西突厥的逃离和投降，使高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致使麴文泰惊惧而死，从而决定了高昌国灭亡的必然结局。

## 第

## 三

## 章

吐鲁番唐代交通路线的考察与研究

## 自然地理概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北部。面积达 1646800 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是古代西域的主体部分。全区地形多样，气候异致，物产丰富。地形方面，新疆高山与盆地截然分界，形成明显的地理单元。巍峨高大的天山山脉横亘于新疆中部，把全区分隔为南北两部。北部在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为准噶尔盆地，南部在天山与昆仑山、阿尔金山之间为塔里木盆地。三大山系与两大盆地大致都沿纬线方向伸展，影响了自然条件的各个方面，也制约着人们在这一地区的生产、生活等各种重要社会活动。本文主要讨论唐代吐鲁番地区内部及其与外部沟通的交通路线。所涉及的地理区域不仅限于吐鲁番盆地，大致以东天山地区为主。

东天山即天山东段，为天山最东部的狭隘山系，亦是天山北弧的东延部分。东天山的山势较低，只有少数突起的山峰，如喀尔里克山、博格达山，但其规模远不如西部天山，冰川规模也不大。东天山西起乌鲁木齐，东止于伊吾附近。全长大致为 670 公里，宽度只有 70~80 公里。全区包括博格达乌拉、巴里坤山脉、喀尔里克山脉